

译林学论丛书

YILIN
XUELUN
CONGSHU



主编 张柏然 许 钧

译学论集

译林出版社



译 林 学 论 丛 书

YILIN
XUELUN
CONGSHU

主编
张柏然 许 钧

译 学 论 集

译林出版社

译学论集

张柏然 许 钧 主编

出版发行 译 林 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淮阴新华印刷厂(地址:淮海北路 44 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9.375 字数 483 千

版次 1997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567-675-5/I·388

定 价 23.50 元

译林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中国译论要有中国味

——代序…………… 张柏然(1)

漫谈翻译…………… 范存忠(3)

一门正在探索中的科学

——与 R. 阿埃瑟朗教授谈翻译研究 …… 许 钧(22)

对建立中国翻译学的一些思考 …… 张柏然 姜秋霞(29)

从学科学的角度谈翻译学的建立 …… 吕 俊(36)

关于翻译理论研究的几点看法 …… 许 钧(46)

翻译本体论的断想 …… 张柏然(55)

翻译理论中的一个新旧交替 …… 古今明(64)

翻译理论研究的调整期 …… 杨晓荣(77)

中国传统译论的美学辨 …… 张柏然 张思洁(85)

文学翻译批评的基本方法 …… 许 钧(96)

漫谈译事难…………… 戈宝权(107)

谈翻译的忠实

——读本雅明《论译者的任务》…………… 王守仁(119)

- √试论可译性的限度……………包振南(125)
- 翻译中的形变与传实
- 兼议等值翻译的相对性……………张亚非(134)
- √“不可译”与“再创造”……………袁筱一(144)
- √是等值还是再创造?
- 对文学翻译的一项调查与分析…姜秋霞 张柏然(155)
- 由表及里,由里及表
- 论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作用……………刘宗和(163)
- 论译者是创造者……………王守仁(170)
- 也谈文学翻译之主体意识……………袁 莉(176)
- 论文体学对于翻译研究的意义……………程爱民(186)
- 翻译的美学观……………黄 龙(196)
- 心理同构与美的共识
- 兼谈文学作品复译……………姜秋霞 张柏然(220)
- 翻译的语言学情结……………袁筱一(231)
- 社会符号学的翻译语义观……………柯 平(243)
- “信达雅”的语义学基础及其实践模式初探……………魏向清(267)
- 略论词义与翻译……………陈宗宝(276)
- 论语言信息内涵意义的翻译……………刘宗和(290)
- 文化差异和语义的非对应……………柯 平(304)
- 信息场与翻译……………杨松河(318)
- 浅论英汉词典的翻译……………郭启新(330)
- 冲突与吸收
- 从跨文化角度看颜色词的翻译…傅 俊 孙旭华(343)
- 口译的心理差异与生理影响……………曹建新(351)
- 汉俄音译的理论与实践……………黄树南 杨锡平(356)
- 怎样提高我们文学翻译的质量……………张威廉(370)

翻译疑义举例·····	范存忠(379)
译莎剧杂谈·····	陈 嘉(400)
情动辞发 披文入情	
——莎剧译品审美感知·····	奚永吉(411)
诗体和散文的莎士比亚·····	张 冲(433)
《叶甫盖尼·奥涅金》在中国	
——谈普希金的名著的六种中文译本·····	戈宝权(444)
论《红与黑》的翻译及其他·····	赵瑞蕻(453)
从德译元曲谈到元曲翻译·····	张威廉(476)
现代学术论著翻译的易和难	
——从校改一篇史学译文见到的问题谈起·····	徐式谷(485)
法语文学作品汉译的几个问题·····	冯汉津(493)
评《茶花女》译本·····	陈宗宝(503)
风格与翻译	
——评《追忆似水年华》汉译风格的传达·····	许 钧(519)
风格三议·····	王殿忠(533)
小说翻译中异国情调的再现原则·····	杨晓荣(544)
理解与表达	
——简评 <i>Tess of the D'Urberville</i> 三个中译本·····	章祖德(568)
于“奇书”与“奇译”之间	
——《尤利西斯》两译本“辨体”审美·····	奚永吉(579)
结合语境,译出原文真义	
——评《理智与情感》的两种译本·····	梅晓娟(589)
含英咀华 译苑奇葩	
——读汪榕培、任秀桦两先生英译《诗经》·····	吕 俊(597)
从编辑角度漫谈文学翻译·····	韩沪麟(609)
编后记·····	许 钧(613)

中国译论要有中国味

——代序

高耸在案头的一大厚帙文稿，是许钧教授和笔者从我江苏译界学人近 20 年来陆续发表的译论中遴选出 52 篇汇集而成的《译学论集》。翻过最后一页，窗外已是万籁俱寂，冷月西斜。正准备宽衣将息，耳畔却响起许钧教授着我为这个集子作“序”的吩咐，不敢有丝毫懈怠，便又抖擞起精神，理清思绪，写了下面几段文字。

集内所收论文，有的是学贯中西、蜚声中外的学界耆宿之手笔，有的是著译颇丰、成绩斐然的中年学者的研究成果，有的则是近几年跃身学坛之新秀的精心之作。这些文章，或从理论的高度，对翻译理论作整体性的把握和全方位的思考；或借鉴“西方话语”，从某一特定视角入手，对所论议题层层剖析，在具体分析中去展示译学的迷人风采；或以美学为纲绳，犹如艺海拾贝，探测挖掘翻译这一特殊的人类“生命—精神”活动的美的灵光。字里行间无不蕴含着以不变的矢志学术之心应万变的潮流变动而清守书斋，奋力笔耕的莘莘学子们的汗水和心血。这些文章还从一个侧面映现出了新历史时期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在艰难中探索前进的轨迹。

中国传统的文化曾经两次受到外来文化的大的冲击。一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文化，一次是近代的西方文化。比较起来，近代西方文化冲击的规模最大，影响又最深。在这一冲击下，中国的美学和译论似乎成了“旧”和“古”的代表，而西方的则成了“新”和“今”的标志，一时间中国传统的美学和译论受到冷遇，岌岌可危，好像不西方化，就再无其他道路可走。然而，文化传统是抹煞不了的，更不能丧失！如果说，80 年代是我们突破封闭式的过去，进行改革开放，大量引进西方现代译论和美学思想的时候，那么，

90年代则是我们在输入西方的同时,我国传统的翻译理论和美学思想重新受到重视且将要广为弘扬的时代。

现在,中国文化的全面振兴不仅迫切,而且可能。只有把握住了我们自己的传统,才可能在对话中充满底气,使弘扬落在实处,为创造打下基础。“中国译论要有中国味”应该成为我辈清醒的使命感,认真而冷静地分析中国传统译论的可继承处、须扬弃处,用现代学理,发掘淘炼,进而为突破仅在古典领域翻滚的旧路,为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及其体系的诞生付出我们所应该付出的努力。

写到这里,似乎该刹车了。也许还有什么可说或要说的话,就“尽在不言中”了。

是为代序。

张柏然

1997年4月21日深夜

于南京大方巷陋居

漫谈翻译

范存忠

一 翻译的原则与方法

(一)原则：从信、达、雅到正确、通顺、易懂

我们谈近代翻译，一般都从严复的《天演论》谈起。其实，在《天演论》出版前数年，《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已经发表过很好的意见。同严复一样，马建忠也是“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人”。1894年，马氏作《拟设翻译书院议》（以下简称《拟议》）。他对“今之译者”深有感慨地说：“通洋文者不达汉文，通汉文者又不达洋文”，其所译之书都是“驳杂迂讹”。因此，他建议设翻译书院，“造就译才”。他说：

夫译之为事难矣。译之将奈何？其平曰冥心钩考，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音声之高下，析其句字之繁简，尽其文体之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夫如是，则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思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①

这里前半段主要谈翻译人员的培训，后半段提出对翻译工作的要求，他的要求是很高的——毋宁说是一种理想。

到了1896年,严复所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完成(1898年出版)。他在卷首订了一份《译例言》,提出翻译的原则,一开头就说: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

他又说:

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者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

这里所谓“信”,就是马氏所谓“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所谓“达”,就是马氏所谓“行文可免壅滞艰涩之弊”;所谓“雅”,也就是马氏所谓“雅驯”,所谓“不戾于今而有征于古”。^②但是,一般谈翻译原则,首先想到的不是马氏的《拟议》,而是严氏的三原则,因为严氏提的原则比较简要而又有层次:比如说,信、达、雅三者之中,信与达更为重要,而信与达二者之中,信尤为重要。我们现在所倡导的正确、通顺、易懂,看来是参照严氏的三原则,针对当前的需要而提出来的。

这里有三个问题可以谈谈。第一,严复为什么把“雅”定为翻译原则之一?要解答这个问题,必须追溯八十多年前的情况。那时,在19世纪末年,《天演论》这类书的读者,主要是或多或少地对改良主义表示同情的知识分子,像严复那样的人。这些人中能有发言权的多半是厚古薄今的“文人学士”。他们高自标举,有的说“宋以后之书不读”,有的说“唐以后之书不读”,有的甚至说“非三代两汉之书不读”。^③严复也不例外。他刻意求雅,以为只有这样,才能登大雅之堂。果然不错。当时桐城派古文家吴汝纶看了《天演论》译稿,以为虽刘先主之得荆州,不足为喻。^④他在《天演论》序里说:“吾国之译言者,大抵舛陋不文。……文如几道,可以言译书

矣。”又说：“今赫胥黎之道……严子一文之，而其书乃駸駸与晚周诸子相上下。”这样，《天演论》不胫而走。但也带来了后果。严复问吴进士，碰到原文里粗俗可鄙或琐屑不足道的东西，该怎么办？吴进士出了个坏主意：“与其伤雅，毋宁失真。”^⑤严译《原富》，就照此办理：有时摘译要义，有时删削，干脆不译。^⑥于是翻译变为改编，成为后世诟病。我们不赞成这样做。我们认为，原文怎样，译文也就怎样，尽可能还它本来面目。我们认为，写书也好，译书也好，都不是为什么“文人学士”，而是为广大群众。为了广大群众，必须用广大群众所容易看懂的现代汉语，而不是周秦诸子的语言。“文必夏殷周”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对汉语写作，也是一大解放。

第二个问题是：根据正确、通顺、易懂这个新的三原则进行翻译，是否容易些呢？不。要完全做到信、达、雅，是困难的，严复就没有做到，他自己也知道。要完全做到正确、通顺、易懂，也不容易。正确、通顺、易懂之间，同信、达、雅之间一样，存在着矛盾。正确，无疑是最重要，如果译文与原文不符，那末通顺和易懂都失去了作用。反过来，不通顺，就谈不到正确（严复说过“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不易懂就不可能为广大群众服务。另一方面，正确、通顺而不易懂，总还勉强可看；如果只求易懂，不管是否正确，那又何必叫做翻译呢？马建忠提到过这种情况：自己不通外语，于是“转请西人之稍通华语者为之口述，而旁听者乃为仿佛摹写其词中所欲达之意，其未能达者则又参以己意而武断其间”^⑦，这种情况现在可能少见。但还有另一种情况：即碰到自己不能懂的部分，干脆略去不译。这些都违反了正确的原则。30年代初期，曾有一位“牛头不对马嘴”的翻译家公开主张“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的谬论。鲁迅是主张“宁信而不顺”的，曾对那位翻译家进行严肃的批判。^⑧总之，正确、通顺、易懂之间所存在的矛盾需要恰当地统一起来，这只有通过不断的努力才能把这工作做得好些、更

好些。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信”或“正确”。“信”或“正确”，一般理解为“忠实”(faithful)。但作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为内容和精神，一为表达的形式。所谓“忠实”，到底对哪个方面而言？有人主张从形式入手。好像说，只要把形式移植过来，精神也就在其中矣。有人不同意。19世纪60年代初年，英国文艺界在希腊诗人荷马诗篇的翻译问题上，展开了一场有名的争论。当时有位叫做纽曼(F. W. Newman)的教授，把荷马的作品在语言上的种种特点(包括英语里难以表达的特点)，设法移植过来。这个译本一出版，诗人、批评家安诺德(M. Arnold)写了一篇题为《论翻译荷马》的长文(1861—1862)，评论纽曼，也评论其他译者，如查普曼、蒲伯、柯柏等人。他认为翻译荷马，首先应该传达荷马的精神，使当代懂得希腊文而又懂得诗的人看了，能和诵读原著有同样的感受。^⑨纽曼不服，安诺德也不让步。一般人的看法是：翻译既要忠于原作品的精神，也要照顾到形式，遗神取貌是不行的。这个问题，特别联系到文学作品的翻译，需要作进一步的考虑。这里提供思考。

我们谈原则，暂时谈到这里，现在谈方法。

(二)方法：直译、意译及其他

几十年来，翻译界在方法上的争辩，主要是在直译和意译方面。何谓直译？何谓意译？历来意见是不一致的。英语里也有各种说法。近来英国有一位叫做卡特福德的语言学者，把翻译分为三类：一为 word-for-word translation，就是逐字翻译，即一个字对一个字翻译；二为 literal translation，就是按照字面翻译；三为 free translation，就是“自由翻译”。我觉得：第一、第二两类，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直译；第三类，“自由翻译”，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意译。那位语言学者举了英语译法语为例：

英语 It's raining cats and dogs.

法语(1) Il est pleuvant chats et chiens.

法语(2) Il pleut des chats et des chiens.

法语(3) Il pleut à verse.^⑩

上面的英语是原文。法语(1)是逐字翻译,也就是一个字对一个字的翻译,英语的语法结构完全照搬。法语(2)是按照字面翻译,译文的语法结构大体参照法语。法语(3)是自由翻译。看来,法语(3)正确、通顺、易懂,而其他各种译法都有问题。法语(1)是用法语来写的英语,法国人没有这种说法。法语(2)合乎法语语法,但法国人一般不说 des chats et des chiens,而说 à verse 或 des hallebardes。

我们按照那位语言学者的模式,举汉语译英语为例:

汉语 与君俱老也,
自问老何如?

英语(1) With you together old become.

Self ask, age what like?

英语(2) 缺

英语(3) We are growing old together, you and I.

Let us ask ourselves, what is old age like?^⑪

上面汉语是白居易《咏老赠梦得》的开头两句。英语(1)用英语写的汉语,对英语语法结构完全不管。英语(3)是惠利(Arthur Waley)的译文,不但大体正确、通顺、易懂,而且译者还想把原诗五言体用英语每行五个重音体现出来。

这样看来,是不是说,“意译”比“直译”好呢?那也不然。在以上两个例子里,“意译”较好,但“意译”有不少品种,严复的译法是其中之一。严复的汉译在我国发生过启蒙作用,这是不容否认的,但是他的译法有问题,上面已经提到过了。这里再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你翻开《天演论》,一开头就看到这么几句: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

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凯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借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

这段文字,通顺、能懂,专读线装书的人一定还觉得相当古雅。但是,毫无疑问,这不是翻译,而是编纂。严复的《天演论》,前有导言,后有案语。全书案语二十九条,除了讲解原文主要论点和西方学术发展情况而外,还针对当时中国政情阐述自己的见解。严氏自己也说:

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
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原文,题曰达旨,
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⑩

严氏所谓“达旨”,所谓“发挥”,一般理解为意译,实际上是编纂,完全超出了翻译的范围。

到了“五四”时期,大家知道这种译法是不妥当的。大家认识到,翻译和编纂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这时期出现了许多优秀译品,但也有不少人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严复“达旨”式的翻译走向各式各样的“直译”。严复说,“字比句次”的翻译是不行的,而这时期却出现了大量的“字比句次”的译品,其动机可能是要对作者忠实;而其效果,却苦了一般读者,尤其是不懂外国语的读者。有的人还说,为翻译方便起见,非把国语“欧化”不可。于是,一个主句可以拖着多少副句,一句句子可以长达百数十字,而前后并不连贯,有人说这是“我们三十六根牙齿嚼不断的句子”。这种译品,名曰“欧化”,实为乱译。叶圣陶的《未厌居习作》里有一段话,摘引如下:

讲到译品，等类颇多。有些是实力不充而硬欲翻译的，弄来满盘都错，使人怀疑何以外国人思想话语会这样的奇怪不依规矩。有些据说为欲忠实，不肯稍稍变更原文文法上的排列，就成为中国文字写的外国文。这类译品若请专读线装书的先生们去看，一定回答：“字是个个识得的，但不懂得这些字凑在一起讲些什么。”

这些译品，从 20 年代到 40 年代，是经常出现的，就是到了现在，偶尔还可以看到一些。

“直译”和“意译”，究竟哪样好些？直到现在，还有争论。但是通过以上的讨论，看来有几点是可以明确的：

第一，上面说过，“意译”相当于英语“自由翻译(free translation)，比 literal translation 为自由，更比 word-for-word translation 为自由，就是说，不用按照字面来翻译，更不需要一个字对一个字来翻译。但是，自由是有限度的，超过了限度，不论它如何达，如何雅，就不能算翻译了。严译“名著”，对当时思想，对翻译技术，都有贡献，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为了追求“雅”，这里改了一些，那里加了一些，显然不是翻译“正法”。他的《名学浅说》(1908)的自序上说得很清楚：“吾之为书，取足喻人而已，谨合原文与否，所不论也。”

第二，如果说“直译”就是 word-for-word translation，即一个字对一个字的翻译，其可能性是不大的。有人说这是原始时期的翻译。因为翻译不是用一种语言里的字句来机械地代替另一种语言里的字句，而是把一种语言里已经表达出来的东西用另一种语言正确而完全地重新表达出来。上面法语(1)和英语(1)，说明了问题。

第三，如果说“直译”就是 literal translation，即按照字面的翻

译,如上文法语(2),在某些场合是办得到的。但是,每种语言里都有它自己的搭配方式和习用语,不可能在另一种语言里找到完全相等的字眼。比如上面提到的英语 *raining cats and dogs*,有人说源出北欧神话,以为狂风暴雨是猫狗作怪,另有人说这是把狂风暴雨比作猫狗打架。这种说法,法语里没有,德语里没有,俄语里没有,我们汉语里也没有,我们叫做“大雨滂沱”或“大雨倾盆”。所以英语 *raining cats and dogs* 就无法移植——即无法逐字移植或按照字面移植。总之,每种译法都有其限度,超出了限度(即违反了正确、通顺、易懂的原则)就不可能产生良好的译品。

二 翻译的基本问题——传达问题

我们说过,翻译是把一种语言里已经表达出来的东西用另一种语言正确而完全地重新表达出来。就是说,翻译这一工作牵涉到两种语言以及两种语言之间的媒介人,即译者。翻译的过程是一个传达的过程:首先由译者理解原文,然后把他所理解到的东西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这里明显地存在着两个阶段:一是理解,二是表达。对译者的要求是,他对原文要尽可能做到透彻的理解,同时,他还得把他所理解到的东西在另一种语言里尽可能做到确切的表达。我重复说了“尽可能做到”这几个字,因为透彻的理解和确切的表达都不是十分容易的事。

先说理解。我们天天同周围的人交谈,好像没有什么隔阂,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可以说,就是同最熟悉的人交谈,也往往有彼此不很理解的时候。碰到这种情况,我们就问了:“你的意思是说……”,或“我没有听懂,请你再说一遍”,等等。资产阶级学者早就注意这个传达方面的问题。四十年前,英国文学批评家瑞恰慈在美国做过一套演讲,题为《修辞哲学》,着重谈论人与人之间的误解。他指出这种误解所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他提到这方面体会最深的几种人。一是教师。教师对学生讲了一套道理,

等到学生回讲时,往往变成另一套道理;主考员、阅卷员也有同样感受。另一种人是作家,特别是经济、社会或政治理论、或文艺评论的作家。他写了一本畅销书,报刊上纷纷评论,有的赞扬,有的指摘。指摘的书评,暂且不谈;作家看了赞扬的书评,也往往觉得啼笑皆非,因为有些书评家并没有抓住他书中的要点。^⑨

那么有没有避免误解的方法呢?有。语文老师告诉我们,理解一句话或一个词,必须通过上下文,不能断章取义。这种上下文关系,英语叫做 verbal context。语言学者把这种关系扩而充之,指出除上下文关系外,还有时间关系,地点关系,文化背景(time context, place context, cultural background),等等。这里举一个常用的例子:

George passed.

这句话只有两个字,真是简单不过,但可能有各种不同的理解。首先要问,乔治在干什么?如果是在踢足球,那末就是说,乔治传了球。如果是在玩桥牌,那末就是说,乔治没有叫牌。如果是参加了某种考试,那末就是说乔治考及格了……动词 pass 是个多义词;多义词在各种不同的关系中会有各种不同的意义。一个词是这样,一句话、一段话,或一篇文章,也是这样。鲁迅说过,“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⑩一点也不错。鲁迅离开我们并不远,但是他写作的各种条件都和现在不一样,所以看他的文章,只有把文章放在上述的各种关系中才能看懂。对鲁迅是这样,对古人、对外国人就不用说了。

至于表达,那是写作或讲话,但是翻译中的表达又和写作或讲话有所不同。我们写作或讲话,毋非是把自己的思想、感情等等表达出来,至于翻译中的表达,那是把一种语言里已经表达出来的东西用另一种语言准确而完全地重新表达出来。一直到现在,仍有不少人以为,移植总比创作容易,其实不然。鲁迅写过下面一段话: